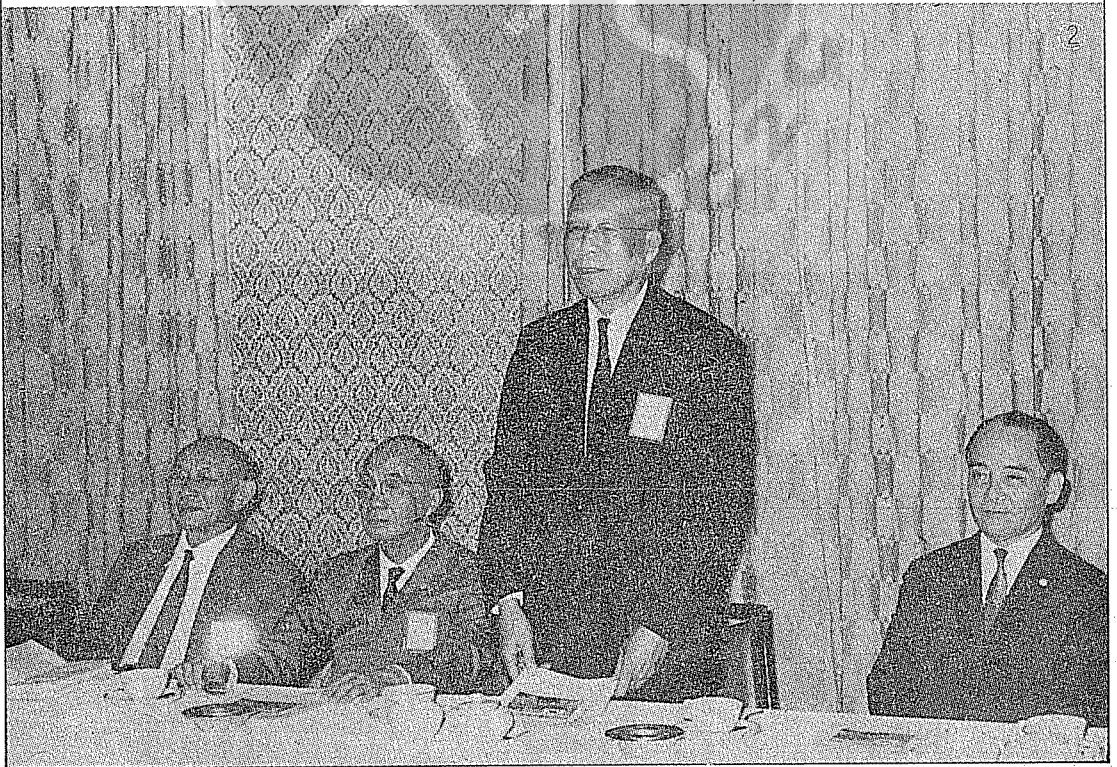




①右起：張其昀、陳慶瑜、戴運軌等在中大校友餐會中留影。

②張其昀在全國教育會談中致詞。右鍾皎光，左一吳俊升，左二程其保。



追懷張其昀先生（下）

蔣君章

在穗見面在臺再見

民國三十七年年底，政治上發生大變局。徐蚌會戰應勝而反敗，就是因為桂系白崇禧所部的華中軍，已至徐蚌戰場而不加入戰鬥行列所致。其時中央軍主力尚強，惟大部分在西北，遠水救不得近火，以此長江下游已成桂系軍的天下，而中共軍的前哨已達津浦鐵路的滁縣附近。在這種情勢之下，李宗仁以副總統的身分提出和談的主張。黨內也出現了和平將軍與和平老人等妖孽附和之。此外，在這個運動的背後還有一股外國勢力，助長聲勢，壓迫先總統蔣公不能行使職務。蔣公盱衡全局，毅然宣布暫停行使職權，發表宣言，返回奉化原籍。其時行政院院長為孫科，副院長為吳鐵城（兼外交部長）。主和的談判，由所謂李代總統主持，孫院長則力促政府南遷廣州。陳布公在世時，是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，我是秘書，外兼中央日報主筆。張岳公羣繼布公之任，我辭職獲留。我自杭州送葬返京，蒙總裁召見，他要政務局長陳芷町先生查總統府空缺委我。會新聞局局長董顯光先生辭職獲准，由沈昌煥先生繼任。沈先生堅邀我出任主任秘書，復託朋友們來勸。感其至誠，復掌公牘。不過月餘，蔣公退職，沈局長隨赴奉化，仍任舌人。行政院派外交部次長時昭瀛先生繼任新聞局長，我面詢時先

生就職日期，時幽默地說：「他們想強姦我，不知道我是男的，他們有什麼辦法？」在無人接替之下，我只好代理其職務，將新聞局遷至廣州。何應欽將軍繼任行政院院長，黃少谷先生任秘書長，行政院在京恢復辦公。四月中，我至南京促任命局長，俾便結束交待。行政院決定改局為處，由鮑靜安先生任處長。我見到鮑先生，約定五月中就任。我便至奉化向沈先生報告，並回家掃墓，於四月二十三日返穗，加緊督促同仁辦理移交事宜。其時我已受台灣新生報謝社長之約任總編輯，交待辦竣，即行來台。大約五月十日前後，氣象局代理局長李鹿華同學急來看我，謂張先生來了。我立至會客室，果見張先生。廣州的五月，已是盛夏天氣，我立託鹿華，先找一家比較好的旅館，買兩套比較薄的中山裝或西裝，帶張先生理髮沐浴，隨手付了一筆錢，並問張先生下一站的目的地，他說：「總裁在台，我要去見他。」我說：「這樣很好，我這幾天忙於督促新聞局辦交代，辦完交代，即赴台灣，就新生報總編輯職。您到台灣，可到新生報找我。在廣州，恐怕沒有長談的機會了。」

鹿華是地理系的首屆畢業生，他和張先生比我更熟，由他招待，決能勝任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在新生報安排好家，先生就來了。在我家便飯後，我為他聯絡到總裁的住所，約定相見的時間，先生欣然離去。時蔣總裁雖然不執行總統的職務，但仍是執政黨的領袖，簿書執掌，辦理困難。當時他暫以後草山的台糖招待所為行館，公務接洽，亦覺不便。當時的兩大問題：其一，如何協助總裁處理公務？其二，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，如何補救？於是決定設總裁辦公室，以草山（後來稱陽明山）的第二賓館（現改建中山樓）為總辦公室，警務處招待所為分辦公室，由俞濟時先生任總務主任，黃少谷先生任秘書主任。以設計委員會為討論問題的機構，下設九組，分別辦事。先生被指定為六組組長，主辦秘書的業務，周宏濤先生與曹聖芬先生任副組長。兩位副組長，都是侍從秘書，不能到組辦公，他等於唱獨腳戲。沒有處理公文的經驗，尤其是做總裁的直接幕僚。當時陶希聖先生是第五組組長，我被指定任五組副組長，協辦研究事項，可以不必日日辦公，但是先生卻需要我做他的顧問。我正痔漏開刀，行動不便，先生特命在辦公室設床鋪，備我休息，我則日日攜帶橡皮圈上山，由兩位同志扶我上下車，真是苦極。我建議依照侍二處分工辦法，黨務公文為一組，原主辦人葉實之先生時任中央銀行理事會秘書，除開會外不需辦公，可請來幫忙，這一部分可以放心。至於軍事、經濟各有專組，可以分交辦理。一般政治問題，或呈閱，或會辦，或擬定辦法請示，處理並不費事。但先

生每當批閱公文時，仍不放心，常令我立於左右，時加諮詢。我建議應找一負責而能守密的人，爲他接收、保管並分發公文，許久才找到一位石先生，我始不再爲他擔任公文保管之職。這段時間，我與先生接觸最繁，而且最受信任。

但是先生的個性，我實無影響之力。舉一個簡單的例子：是年夏間，正是先生五十歲的生日，山下有許多同學上山來，爲先生祝嘏，並且送一點紀念品，要我帶進去見他。我猶豫了一下，認爲這也無傷大雅，即使方正如陳布公，亦必以客人相待，謙辭婉謝而已。經這樣一想，我對他們說，試試看，來意你們自己說。他一見十來個人同來，已經不高興；及聞祝壽，請他吃飯，送紀念品，他氣得臉都紅了。我只好打圓場，建議就在衆樂園吃個客飯，請先生參加，意思表達到了，但並無痕跡。飯後，我請大家洗溫泉澡，作爲餘興。先生總算給我面子，答應同去吃飯，同學們也算下了台。所以後來先生生日，我只是到他府上投個紅片子。後來華岡學生爲他大壽而特壽，先生欣然接受，判若兩人，思之爽然。

民國三十九年三月，總統復行視事，總裁辦公室結束，命先生出任中央宣傳部長，他特別約見我，要我隨任副部長。我說：「這是不可能的，宣傳部原有一位副部長任卓宣先生，又已新任沈昌煥先生爲副部長，不可能辭去任先生，也不可能增加一位。」他說：「那你任主任秘書。」我說：「中央都會無主任秘書，宣傳部老秘書陳天鵬先生任職二十來年，熟悉全部公事，不可轉換。」「那麼你任專門委員。」我知道他極關心我，

也極想重用我，但他不知道職位，雖然我從不計較名義，但由副部長而專門委員，幾分鐘之間連降三級，未免心中暗笑。因此，我對先生說：「我的工作，自有人爲我安排，請放心。如有需我協助之處，我必盡力而爲。」果然，不久，我被任爲總統府秘書，在機要室辦公。但專門委員一詞，竟成日後的笑話，其偶然性若是，可爲失笑。

時先總統蔣公主持宣傳會報，由陶希聖先生任秘書，我任助理秘書，實際上就是擔任記錄。記錄經陶先生批准後，將應辦之事通知有關部門。先生爲宣傳部長，是當然的出席者，而且要作報告，陶先生當然也要作報告。陶先生自民國三十一年起即任總裁的機要幕僚，對宣傳業務接觸極多，其報告扼要而深刻；而先生的報告，時有不成熟的論調。我怕他們兩位之間有發生誤會之可能，所以每在會報之前，我總到宣傳部去找先生，有時候他也找我。可是我一到宣傳部，先生必引我至蔣夫人辦公室談話，其實也沒有不可告人之事，而我一出一入，全部同仁注目而視，把我當作神祕人，我覺得有些犯不着。不久，我被借調去資料組辦公半天，研究各方報告之足資呈閱的材料，而先生與陶先生終因中華日報問題，弄得很不愉快，我也沒有時間爲他們作橋樑。但是每週定期見面的機會還是有的。原來，在張先生出長宣傳部的時候，總裁交給他十萬元新台幣，作爲辦理文化宣傳事業之用。因此，他組織中國新聞出版公司，假氣象局辦公室爲公司地址，設董事會。我被指定爲常務董事，每週聚餐一次，討論進行事宜。羅時實先生也是常務董

事，鄭子政先生與李鹿萃先生均爲董事。不知道是先生自己的構想還是羅先生的建議？主張仿美國時代雜誌或新聞周刊，辦一個叫做「中國一周」的週刊。對此，我有不同的意見。新周或時代的特色是新聞祕訊的特稿多，其撰述者遍於世界重要國家或地區，時有引人入勝的著述。中國一周沒有能力這樣做，勢必炒一週時事的冷飯。這是半官方的刊物，也不能以時論取勝。要想利用中國一周賺了錢來發展文化事業，希望似乎不大。但是先生的意志十分堅決，就這樣分配職務，羅先生似乎任總編輯（不久辭職），鄭子政任經理，鹿萃任副經理，李士英先生撰專論，我撰社論，力辭不獲准。當時，我每週分別爲中央、新生、民族等報撰五篇社論，非此無以爲生，又增一篇，實在心餘力絀，但也只好接受。中國一周的發展如何？知者甚多，此不贅述。中國新聞公司組織龐大，喧賓奪主，鹿萃之失氣象局，是否與此有關？不得而知；而我卻是爲了中國一周一百期的一篇文章而失去公務員的工作。失去公務員對我是塞翁失馬，但是這篇「宋子文莫斯科談判追記」，文卷上寫明此文能否發表，務請送張先生決定；而且張先生的確看過這篇文章，在我內子面前，曾作許多稱許。但發表後一個多月，有人以我洩密向總裁密告，總裁問張先生，張先生卻以「不知」爲答。於是總裁下令「免除一切職務，並不得參加各種工作。」先生要我不必辭中央日報主筆，我敬遵鈞命辭去所有職務。只有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萬耀煌先生不准，每月仍託人送薪至家，雪中之炭令我感銘肺腑。在我賦閒期

間，我與鹿奉合畫一本世界地圖，當時在台堪稱創舉，內容亦首屈一指。我以此分贈周宏濤先生與張先生，周先生認為可呈總裁一冊，並加簽請：「可否停止處分，以後酌派工作。」總裁准之。張岳公隨即派我為實踐研究院專門委員。此簽仍需張先生之同意，也應了張先生邀我至宣傳部給我的名義之預言。此一簽請，雖是周先生的原議，但我仍對張先生深為感激。

教育部國際合作委員

在我賦閒期間，張先生仍時加照顧。他轉任教育部長時要我去看他，曾許我以某種職務。事後他也忘了，我也不以為意。在張岳公任總統特別代表訪日回國時，我與教育部張主任祕書約，坐便車至機場往迎。當我上樓時，正好張先生下來，問我是不是去機場？「就坐我的車子好了。」在車上，先生告我：「日本道德科學研究所請孔奉祀官訪日，教育部可派一人，但未派，你去如何？」我知道這是張先生在提攜我，同意了。他給了我一個「國際合作委員」的名義，除負擔來回機票外，並給美金二百元，作為收集資料費。與孔先生同去的還有屈先生和陳先生。一路上，我感到屈先生對我歧視，因此，有關孔先生的活動過程之商議，我概不參加；有時候以為教育部搜集資料為理由，由文化參事宋越倫先生代治，另行訪問日本的地圖出版所等機構，與孔先生分道揚鑣。但屈先生對我還不諒解，他在香港的民主評論上發表一篇大作，意在封我為「教育特務」。我看到了，只有哈哈大笑，只向編者金

達凱先生去函，說明我赴日經過和在日活動的大概。後來屈先生大概明白了他的誤會，在教育部會議席上兩次遇到，他特別過來和我握手，是不是表示歉意？毋須研究。大丈夫敢作敢當，是特務，賴不了；不是特務，裝不上。那時候我是一品老百姓，知道我的人是不不少的。做了教育部的國際合作委員，麻煩又來了。那時，日本書刊進口，管制甚嚴，這是教育廳的工作。日方訪客，向先總統蔣公要求解禁，蔣公改令教育部辦理。張先生想到了我，把這個責任交給我。我擬好了要點，先求張岳公指點。我的要點：其一，仍須審查；其二，行動要快，免使日人生疑；其三，不能進口者速退，能進口者速放，收到後三日內辦完；其四，多請些各方面的日文專家，待遇要厚，發放要快。岳公稱善，囑迅速辦理，因為總統迫得很緊。於是我把這些要點條文化了，呈請張先生核示，他也同意了，並且囑我在下次部務會議上報告。我恭而敬之的出席那次部務會議，作了報告。但在我報告完了之後，他宣布這一辦法不必研究，總統說過「檢查」是野蠻行為，此後不必檢查，要我擬一個不檢查的辦法。會後我特別看他，我說：總統如果真的要檢查，他要左右打個電話就行了，何必作明白的宣布？這可能是對付日人催迫的方法。而且不檢查，要什麼辦法？何必要教育部擬辦法？他說：「你還是起草一個辦法吧！」這一諭令，我沒有執行。二、三星期後，他催我的辦法。我回答他：「不敢擬，除非你下條紙。」他說：「有人替你負責，你為何不敢？」我說：「不檢查的結果，日本出版物可

能黑的紅的黃的都來了，有人一反映，下令一查，又是我擬的辦法，那我就能担得起嗎？」他條紙也不下，我也不起草。大約又經過一個月，張岳公電話召我，口氣殊不善。我匆匆趕去，一隻腳才跨進辦公室，他疾言厲色的說：「你的檢查辦法，怎麼還不下來？又要開會報了，大家挨罵！」我第一次看到岳公這樣不高興過，因此不能不把經過情形全盤托出。他還是語氣很重的說：「他到過外國嗎？任何國家，一踏進它的領土，第一道手續就是檢查；莫非世界沒有一個文明國家？你就告訴他是我說的，非檢查不可。」我到教育部，只得面見先生，把前面一段話略了，只說岳公召我，說日本進口書刊還是要檢查，而且辦法要提得快，否則有挨罵可能。張先生這才把我的辦法提出來，總算得到最高當局的批准。這件事的執行，當然落在我的雙肩上。這是特急件，我在侍從室工作時常常遇到的。但在教育部便不易辦通。應該發的錢，幾道手續轉下來，常常一、二十日發不下來，審查人交稿也就不準時了。會中王姓青年，日文很好，而且極負責任，我要他把普通書籍帶回去，晚上審閱，另給報酬。他辦到了，但會計方面不同意，我只好自己負責，祕密地把我的車馬費付給他。我做這件事大約兩個月，還沒有出過紕漏，做下去，至少拖延時間是不成問題的。見好收蓬，是為上策，我藉故辭職，和張先生的關係暫告段落。

張先生接任革命實踐院主任時，我已經就政治大學教授，中央日報也由胡社長健中先生聘我回任主筆。因此，我辭去研究院的專門委員（人

在倒臺時，繩都變爲蛇，那時我已是一品百姓，而院中却有造謠者說我是官邸派，入院是要搶什麼位置，我辭職了，他們應該啞然失笑了。張先生特別關照，要我進台灣建設研究院第三期受訓。我一生沒有受過訓，在重慶中訓會工作時，副主委段錫朋先生兼中訓會教育會主委要調我至中訓團工作三個月，作爲受訓結業，我都沒有同意。當時正中書局以國立編譯館編譯的名義，邀我赴越南自由太平洋協會編華校中文的史地與公民教科書，約定一月前往，我可以請正中具文請假。但知朋好友，認爲名單既經核定，犯不着授人以口實，亦不可負張先生之盛意。我赴越南只好延期一個月，以致至四月下旬纔回來，受了半個夏季的炎熱，而政大補課，也頗感不便。但是我總算多了一項出身的頭銜，對我來說，總是有益的，所以我仍感激張先生。

文大與布公新聞基金

張先生在任職國防研究院主任時，似乎已有辦一所大學的計畫，他在教育部部長任內恢復若干大陸上原有的大學，也許是這一計畫的先聲。那時候我和先生見面的機會不多，我直覺的給他寫了一封信，我說：您將受到許多困擾，爲什麼不仿照抗戰時期的辦法，設立華中、華南、華北等聯合大學，那一個大學希望復校的，就加入那一區的聯大，把他們團結起來，反攻復國時還可以請他們接收原校。先生給我一個電話，認爲構想很好，何不早說？我說不知道您有恢復政治大學的意願。雖然那時候新設大學，尚在嚴禁，但他

在山仔后買了一方土地，樹立起遠東大學的招牌，這些我都不知道。我知道的時候，是教育部部長黃季陸先生同情他的願望，准許先成立三民主義研究所的時候，他找我談話，從他的口中，我才知道遠東大學改爲中國文化學院而先成立研究所的曲折。這塊招牌被總裁發現，他認爲在新設大學未開禁以前，由他來發起破例，頗爲不妥。先生陳說他辦大學的理想，總裁默然。過了幾天，張先生收到總裁手書長達八張信紙的一封信，只同意辦一個中國文化學院，以闡揚中國文化爲宗旨，務在精密，但並沒有說到何時開辦的問題。黃季陸先生曾向我說：先辦三民主義研究所，是他想出來的過渡辦法；在解禁設立大專院校之前，先研究三民主義，是沒有人敢反對的。可是只招研究生而不招大學生，只有支出，沒有收入，却苦壞了張先生，因爲學校只有借錢造的校舍，並無準備金，連每一學生每月八百元的膏火費都沒有來源，這就是張先生找我的原因。因爲我手上保管着陳布雷先生新聞獎學基金約三十多萬元，他希望我把這筆基金轉到文化學院代管。這個基金管理委員會，由全體發起人推選董事，由董事推選常務董事三人，互推一人爲主任委員。主任委員是陶希聖先生，另外兩位常委是張道藩先生和胡健中先生。大家都推我爲總幹事，續爲布公有關之事服務，既都屬意於我，我是義不容辭的。我把這一情形向張先生作一簡報，並且堅決的說：「這絕不能私相授受，假如要辦的話，非經全體發起人同意不可，以我看絕無辦成的可能，您不妨先向道藩先生探問一下。」隔了幾天，在

胡一貫先生的公子婚宴席上，道藩先生特別向我嚴重警告：「這筆基金，如果移轉保管，將唯你是問。」我以爲已向張先生如此說了，他應該知難而退，不料他真的問道藩先生。聽道藩先生的口氣，好像我已同意的。我在驚訝之餘，實在佩服他的勇氣，同情他的經濟窘況。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，我遇見了陶先生，談及此事。陶先生真够意思，他說：「我們在利息收入項下，負擔三個研究生的膏火費，至大學部招生時爲止。這樣做，應該不會有人反對，你辦好了，我負責任。」翌年，大學部正式招生了，張先生要我上去兩門課。我因時間抽不出來，答允上一門，即是東亞地理，學生人數極多，在一個大教室，講得聲嘶力竭。第二年上的東南亞地理，在一個橫寬豎短的教室上課。這是新建築，但教室却非常不合理，站在中間講，正常的發音，兩邊的學生聽不清，講高了，中間的學生嫌鬧，無可奈何，只好選一個適當的角度斜講。第三年開始，鐘點費發得出了，我便辭去教職，自此與張先生見面的機會便不多了。

可是張先生仍然把我放在心上，文化學院設哲士還有一個什麼士的時候，他便給我一個什麼士（對不起，我已忘記了）。他計畫設大量研究所時，他給我一個講課研究所主任的名義，指定了辦公室，還給我一個助理。這位助理兩次要我去辦公，我不得不又去見張先生，表示感謝，並說明興趣不在這方面，建議像這樣好的名義，應該請捐得起錢和書的人擔任，對我有興趣的研究，我必盡力而爲。先生對此，頗能諒解，使我更爲

感激。有時候，學校有什麼新計畫需要討論，也要我去參加。只要有通知，我必出席，但我的個性，不喜歡多講話，以了解其發展思想為已足。但是我對文化學院有關的事，也始終放在心上。例如五十七年我在患心臟病剛從醫院回家，有人來看我，他知道張先生將開除一個新聞公司的老職員，這個老職員已搜集證據，俟解職令下即向法院起訴。我無法與先生聯絡，乃告李鹿萃兄要他調處一下。張先生知道後，把這位要被解聘的同事，升任講師，還安置他的太太，給了一所住宅。這足以說明我對先生之事是備極關切的。文化學院一天發達一天，樓台亭閣一天多一天，學生一天多一天，城區部成立，夜間部設置，擁有學生之多與研究所之多，已為自由中國各大專院校之冠。我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憂。喜的是先生赤手空拳，創辦大學之成功，其奇蹟蓋效法國父赤手空拳創造中華民國之奮鬥；憂的是他的創造精神，永無止境，一個計畫還沒有完成，一個計畫又開始，其經費大多出於借貸與募捐。募捐的範圍越來越小，利息的負擔越來越重。大家都知道文化學院學生的繳費，常向銀行為之，覺得很新奇，實際上是這一期的學費已向銀行抵借而是一種還款的辦法。聽說有時還吸收私人的存款，長此下去，如何才能有收入？我和張先生有如此深厚的關係，怎能不為之耽憂？所以先生辦學的精神，是成功的，而且是空前的成功，但其無止境的發展是值得研究的。每次大專聯考發榜，我注意最低錄取成績的學校，常使我簡直難以相信。文化大學現有學生一萬八千名，名

副其實的大學，這一目的達到後，應從善後着想，很想建議不必要的開發與建設，應暫時停止；師資與圖書及其教學上必須的設施，應予加強，俟學校沒有利息負擔後，再言其他。但是先生在華岡的時間多，專程去一次，甚為困難；而且先生堅強的個性，以前和我關係最密切的時候，也未必有效，何況今日，不說也罷。

操勞過度損害健康

聽說先生病了，我常到師母處探聽消息，知無大礙則喜。後來聽到出入榮總多次，每於歲朝前往賀歲，見其精神還好，已甚不放心。今年賀歲，他的臉色轉黑（在醫院是見不到太陽的），知非吉兆，所以我特別多坐一下，而且和他談些家常及未來，知其求生力仍強，不再作杞人憂天。不意此別竟成永訣，傷哉。關於張先生立言、立德、立功的事蹟，自有篆筆，為其所傳世之作。我哀悼先生，僅以我所知道，尤其是和我有關者為限。但有一點，我不能不特別一提，那就是先生的勤勞、清苦與廉潔。他在台之初的十多年，貴為最高當局的幕僚長、部長、最高當局直接主辦機構的幕僚長，特獲信任。但他朝出晚歸，由師母獨守家門，常常連一個女傭都沒有，完全是普通人家的家庭生活。他的最高興趣，是讀書、寫作（包括著作和論文、短文）、發表著作與出版事業。他初任中央黨部的秘書長時，我被任為秘書，周副秘書長將公事印章交給我，意即由我代理其職務，而把重要公文內容向其報告。因此，我與他同室辦公，但他並不重視我的工作性

質，公文都不經我手，致我常向周副秘書長交白卷。這倒還沒什麼，但我看到他親自處理一切公私文件之苦，無論私人的或公事的信，他都親手拆封、批覆，空下來就寫文章。

我在某晚找個空的機會（很少）和他聊了一下。我問先生：「是不是生活上還需稿費？」他說：「不需，這是我的習慣。」我說：「從前你有意見須達宸聽而沒有機會，是不是？」「是的。」我說：「現在您是最高當局的幕僚長，你有資格直接建議，經批准，便有直接成為政令的可能，而且以您現在的地位，多發言論，易滋錯覺，反成問題。」他不以為然，問我：「那杜佑豈不是一個很壞的宰相？」「是亦不然，通典可能是杜佑門客所為，如胡林翼讀史兵略為張廉卿等所為之類，也可能是退職後所為；如果在宰相任內，不考慮政治問題，專作通典，那還當什麼宰相？」這是我的答覆。他幽默地笑了一下，但文章照寫不誤。他只採用了我一個建議，就是指定一個專人替他收發文件，作成摘要，分類呈閱，不必要的私人函件，指示其覆法，由他起草、繕寫、蓋章、發出。這也節省不少精力。近時他除主持這樣大的大學，依舊著作不懈，中華五千年史的陸續出版，便是事實。他精力的透支，實太過分了。先生念念不忘於他所辦的中國文化大學，已由全體董事推鏡湖師兄接辦，在天有靈，應無憂慮。獨中華五千年史，也就是先生最後鉅著，當亦有入室弟子續寫完成，以慰先生在天之靈。但總是歷史著作方面的大損失。屬筆至此，先生似在目前，不勝淒然。（七十四年雙十節）